

【世界经济变革】

2008年以后,全球经济在短暂反弹后陷入了长期停滞。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在2016年初的估算显示:与危机前5年相比,危机之后的5年当中,20个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整体放缓了1.5个百分点,20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则放缓了2个百分点。2014年,G20领导人提出了通过经济政策协调,在5年内将全球经济增速提升2个百分点的宏伟目标。2016年已经是第三年,而在最近的一次评估中,IMF认为这一目标最终可能只能完成0.8个百分点。在长期增长停滞的背景下,美国、英国和印度开始修改GDP统计口径,日本和欧洲国家不断突破传统货币政策的框架,但是却迟迟未见釜底抽薪的结构性改革政策。2016年的G20峰会和全球经济治理,已经进入到中国主场时间。如何认识全球经济面临的实际结论?如何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与国内的供给侧改革相联系起来,协调推进?本次笔谈专门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化与我国应对战略研究》课题组的四位成员,从全球技术进步放缓、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全球投资下滑、国际贸易治理规则四大角度进行了讨论。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 新问题和新的挑战”笔谈

【作者简介】曹永福(1976-),男,山东寿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宋锦(1984-),女,山东邹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陆婷(1983-),女,广东广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苏庆义(1984-),男,山东曲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长春),2016.4.75~8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A081)。

从产业革命历史看当前全球技术进步放缓

曹永福

2008年-2009年全球“大衰退”的导火索是金融冲击,因此复苏阶段学界普遍关注金融因素,更多讨论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以及财政货币政策的刺激问题。但经济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是促进中长期经济增长、提高民众福利的核心驱动力;经济周期理论也认为,经济波动与科技创新、技术扩散紧密交织在一起。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慢,

在讨论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时不能回避技术进步这一核心问题。

笔者首先用统计数据证实当前全球技术进步速度的放缓,然后结合三次产业革命的历史剖析这种现象背后的趋势性原因。

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回顾与新态势

技术进步的测度较为复杂,常用方法是用产出扣除各种投入要素的贡献得到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用该指标测度技术进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成员国的TFP进行

系统测算,目前公布的数据范围为1995年-2014年。此外多个研究机构发起的KLEMS项目^①测算了重点国家的TFP数据,其中对美国的测算最为系统,2013年4月发布的美国数据范围为1948年-2010年。为将当前的态势放在长时期内进行比较,本文将1995年之前美国的TFP增速作为全球技术进步的参照。

TFP增速随经济波动而上下波动,因此观察中长期趋势更有帮助。图1虚线代表美国TFP增速的移动平均值,可以看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TFP增速较高,但在20世纪70-80年代初有所下降,20世纪90年代后又有所提高。从OECD公布的最新数据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TFP增速呈阶梯式下降:1995年-2000年19个OECD国家年均增速为1.5%,2001年-2007年下降到0.9%。2008年-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TFP增速剧烈波动^②,2011年-2014年是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期,OECD国家TFP平均增速为0.3%,只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1/5。

技术进步速度放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引起各界对世界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下文将结合产业革命历程重点讨论二战以来世界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

二、从工业革命到信息技术革命

人类在18世纪中期—19世纪中期经历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中期到二战经历了以电力、内燃气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两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技术进步的集中爆发。Gordon(2012)认为20世纪50年代进入计算机和互

联网革命时代,这轮长波一直延续到现在^③;而国内学者陈漓高等(2009)参考其他西方学者的划分,将20世纪50年代到1991年归为计算机革命时代,将1991年至今归为信息技术革命时代^{④-⑪}。尽管时期划分略有差别,但上述学者对二战以来全球技术进步的起伏是有共识的。

二战结束后各国迅速开始重建,而且战争期间各国投入巨资取得的军事科技成果大量转为民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生产率高速增长,经济出现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增长时期。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这轮技术应用的效力开始衰减,再加上石油价格高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等原因(Fisher, 1988)^{⑬-⑰},20世纪70-8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生产率增长大幅放缓,经济出现长期滞胀。

在经历上述低潮之后,20世纪90年代美国迎来互联网革命时代,企业生产组织模式、居民交流通讯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经济”的概念风生水起,美国迎来二战以来最长的一轮经济扩张期。美国的互联网革命浪潮辐射到世界各国,促进全球TFP增长。但随着投机资本不断涌入,互联网泡沫过度膨胀并且于20世纪末崩溃。

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缺乏新的产业概念,全球TFP增速也出现回落。在宽松货币政策和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并吹起新的泡沫。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扩张更多的是真实产业繁荣,那么2001年-2007年的美国经济扩张则有更多投机性繁荣的成分,房地产市场泡沫在2008年最终崩溃并导致了后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图1 美国与OECD国家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www.worldklems.net。

三、信息技术革命结束了吗?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界普遍期待新一轮产业革命将世界经济带出泥潭,直到经济复苏持续7年之后这种迹象并不明显。但值得关注的是,曾经受到泡沫破灭冲击的信息技术产业却表现出新的、顽强的生命力。

新世纪以来移动网络逐渐普及,时时互联、处处互联成为现实;随着计算能力和数据传输能力的提高,云计算、大数据等概念逐渐兴起。OECD多年来一直发布《信息技术与通讯产业发展展望》报告,从2012年开始该报告更名为《互联网经济展望》,后来又更名为《数字经济展望》(Digital Economy Outlook)。OECD认为物联网、大数据等概念正在引领第二次信息技术革命,OECD对世界技术进步潮流的判断是有代表性的。

曹永福(2014)对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即2002年—2012年美国分产业的就业、劳动生产率进行分析,发现计算机系统设计与服务业的就业增长40%,远超过服务业整体7%的增幅,而且该行业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很小^[4]。此外2002年—2012年计算机与电子产品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29.2%,远远超过耐用品制造业的年均增速(7.9%),是19个制造业行业中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从服务业看,信息传媒业(尤其是广播与通讯、数据处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也远远超过批发贸易、交通、金融、教育等行业。因此信息技术产业仍然是美国的明星产业。

Byrne等(2013)的测算表明2004年—2012年信息技术产业对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比过去有所下降,但仍然超过40%^[5]。因此,当前全球仍然处于信息技术革命的长波之中,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这段时期可以概括为第二次信息技术革命时期。

四、从工业革命到信息技术革命的技术进步效果

蒸汽机革命、电气化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三次产业革命,但学者们普遍认为信息技术革命的效果小于电气化革命,而其中第二次信息技术革命的技术进步效果又小于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

Bernanke(2012)在演讲中生动地比较了信息技术产业革命与电气化革命^[6],Bernanke回忆了50年前即1963年他的童年时期,当时他的家庭有空调、洗衣机、冰箱,有舒适的汽车,这些设备和今天的差距并不大,尽管当时没有互联网和电子游戏,但是有收音机和彩电;但如果再回溯50年到1913年,那时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都非常艰苦,对冰箱、洗衣机等设备闻所未闻,大部分家庭没有通电,福特汽车的生产线刚刚出现。1913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为53岁,1963年为70岁,到2012年虽然有所增长但只增加到78岁。过去50年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产业革命的确带来经济和技术转型,但Bernanke用鲜活的例子说明其重要程度要低于电气化革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Gordon(2012)^[1]也支持上述判断。

第二次信息技术革命虽然有很多热门概念,但其技术进步效果需要冷静思考。Gordon(2012)指出,计算机的引入曾经极大地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1];目前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各种设备更为快捷、方便(比如IPAD代替笔记本电脑),但劳动力节约的边际效果变小了,而且很多技术创新(如脸书)应用在交际娱乐而不是生产方面,因此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二次革命的技术进步效果小于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Gordon的判断可以得到统计数据的支持,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计算机与电子产品的价格年均下降20%,而新世纪之后年均价格下降7%—9%,这种价格变化是技术进步速度、产品优胜劣汰速度的映像。

五、结论

人类已经经历三次产业革命,当今世界仍处于信息技术革命的长波之中。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信息技术革命的技术进步效果小于电气革命,而第二次信息技术革命的技术进步效果又小于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因此全球技术进步速度放缓在所难免,这可能是各国不得不去面对的现实。

本文的分析仍然有缺陷。强调信息技术革命不应忽视其他新兴技术如生物医药、清洁能源等等对生产率的贡献。但与上述具体行业技术不同,信息技术带有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的特点,它可以对整个经济中的各个行业产生辐射作用。

本文的数据主要基于发达国家,尤其关注处于全球技术前沿的美国,笔者没有讨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前沿公司和其他公司之间的技术扩散。这也将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该项目由哈佛大学教授乔根森发起,项目英文名称 KLEMS 中的 5 个字母分别代表资本、劳动、能源、原材料和服务。

②2008、2009 和 2010 年 OECD 国家 TFP 平均增速分别为 -0.9%、-1.81% 和 1.83%,为剔除数据过于剧烈的波动,图 1 对上述 3 年的数据取平均。

参考文献:

[1]Gordon, Robert. Is U. S. Economic Growth Over? 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J].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315, 2012.

[2]陈漓高,齐俊妍,韦军亮.第五轮世界经济长波进入衰退期的趋势、原因和特点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9(5).

[3]Fisher, Stanley. Symposium on the Slowdown in Productivity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88, 2(4): 3-7.

[4]曹永福.美国信息技术二次革命影响经济走向[N].上海证券报,2014-06-18.

[5]Byrne, D., Stephen Oliner and Daniel Sichel. Is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Over?[J].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Federal Reserve Board, 2013.

[6]Bernanke, Ben. Economic Prospects for the Long Run[J]. Remarks at Bard College, May 18,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经济结构转型与劳动力市场调整

宋锦

当前,各国劳动力市场普遍面临挑战,失业总量持续增加,就业质量存在显著差异,技能匹配问题日趋严重,就业安全性不足,就业收入增长放缓,社会保障有待扩面,保障政策的设计和保障效果也有待改善。与此同时,外部因素的变化增加了劳动力市场问题的复杂性,也给解决就业问题带来挑战。

一、各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三大结构问题

第一,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和经济的转型重组带来了就业机会的缺乏,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不论在中国还是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放缓、结构转型、贸易模式改变等因素带来的就业调整都是不容小觑。这种就业调整既包括新增岗位的不足,更包括即有工作岗位的损失。2015 年全球失业人口达到 1.97 亿,并预计在未来两年内持续增加。经济结构转型所引致的失业的增加,给个人和社会都带来沉重的成本。虽然结构转型从长期来看具有经济效益,但失业给人力资本造成的损失、转移安置给政府带来的挑战都是关键的政策问题。

就中国而言,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导致了一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行业包括煤炭、钢铁、水泥、玻璃、铝等。2016 年初国务院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提出,根据对煤炭、钢铁行业的初步统计,预计 180 万职工需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被分流安置,其中煤炭系统下岗职工人数约 130 万,钢铁系统约 50 万。而根据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单 2016 到 2017 年间,五大产能过剩的行业中就有 300 万职工面临失业。就业的重新匹配和安置是政策关注的焦点。推广灵活就业虽然能够缓解失业对劳动者生活质量的影响,但也抑制了就业质量的改善,并且从长期而言,灵活就业对劳动者适应新的产业结构并获得正规再就业的效果不明显。

第二,劳动力供给总量放缓、结构显著变化。近些年来,发达国家老龄化问题不断加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老龄化问题也开始显现。G20 各经济体中,19 个国家和地区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老龄人口比例持续上升问题。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日趋严重,2015 年未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全球已经超过 20 亿,并且该劳动参工率在 2020 年之前还将持续下降。劳动力总量供给的放缓和结构性变化,迫切需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于经济的发展带来的预期寿命提高和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正面临

前所未有的老龄化问题。研究显示,中国的老龄人口从2010年开始迅速提高,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25%,2050年,老龄人口将达到1/3;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已达到峰值,此后数量逐渐下降。与此同时,家庭收入水平提高的收入效应使得劳动力参工率不断下降。中国女性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全职家务劳动者的比例在2013年为9%,这一比例在2007年仅为3.2%。劳动力总量供给的下降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出要求,然而劳动力供需结构的变化可能导致短期内市场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回报率提高,2007年到2012年期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率达到17.1%。这种变化不利于劳动者对中等以上阶段教育的投资。

第三,就业转换以及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仍需进一步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降低就业转换成本、提高就业匹配效果的重要机制。以财政可持续的方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保持就业激励,是改善社会保障的重要目标。由于社会保障的福利差别,不同国家都存在对劳动力迁移的普遍担忧,这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和就业匹配的质量。同时,过高的福利水平也可能带来利益固化,劳动力流动性下降,并给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反过来也影响到生产率的提高。

比如,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目前就仍存在较强的区域壁垒。这种区域壁垒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提供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筹资有关。以中国的城镇低保标准为例,2015年12月,中国区县一级制定的最低收入保障标准在河南省西华县为每月195元,在深圳市下属的所有区县则为每月800元,即使扣除生活成本的差异,这种地区间保障标准的差距也是令人瞩目的。地方财政的筹资职责使得流动人口往往被排除在流入地区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之外,这也进一步影响了资本与劳动的匹配效果。考虑到前文提到的经济结构转型使就业面临大规模重新配置的结果,改革户籍制度、提高社保资金的统筹层次、保障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对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有帮助。

二、应对结构转型调整劳动力市场政策

针对前述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大力发展就业再配置所需要的技能培训。长期而言,经济结构的调整、技术革新的加速、绿色经济的发展,都直接指向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的政策。下岗职工往往不具备转移到新的、快速发展的行业的技能和条件。提供技能培训以匹配劳动力资源和产业需求非常关键。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培训的再就业效果,需要不断完善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对此,需要尽可能引入企业对培训的充分参与。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东欧和中亚地区经济转型中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典型问题是劳动力的供需双方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同时,技能培训的提供应鼓励私营部门参与,提高竞争,并增强培训形式的灵活多样性。

2. 改善市场的再就业环境,这包括完善再就业服务(例如提供职业咨询、发布招聘信息等)、鼓励自主创业、提供公共就业岗位和鼓励劳动力流动等等。有研究表明,在中国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国有企业改制和大规模职工下岗中,设立再就业中心的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速度比不设立的情况下要快22%。需要注意的是,改善再就业环境并不创造长期稳定的劳动力需求,也不能提高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即使提供公共就业岗位,形成的就业匹配也在规模和持续性上具有局限性。然而,改善再就业环境对于缓解转型阶段短期且集中的就业挑战具有重要作用。

3. 为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失业提供社会保障,保障手段包括专项经济补偿、失业保险以及维持下岗职工的教育、医疗服务等。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8+1”的社会救助体系网^①,然而,应对大规模就业调整,包括低保在内的社会救助政策不足以提供有力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在产业机构调整所涉及的大规模就业转移安置中,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宣布,中央财政将拿出1000个亿的奖补资金用于职工的安置。对于这一专项资金的使用,补偿标准、补偿周期、对象分类、支付方式都需要进行合理的政策设计。否则补偿的覆盖面、充裕程度、瞄准效果和再就业激励都可能受到影响。

4. 应当注意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地区性问题。产业分布往往具有显著的地区特征,在经济转型中,不同地区面临的就业挑战的差别尤其需要中

央政策的协调。欧盟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方面,从结构基金(Structural Fund)和凝聚基金(Cohesion Fund)中进行专项拨款,支持落后的成员国地区。对中国而言,重工业转型所涉及的就业调整可能使山西、内蒙古等煤炭和矿产的主产区、河北等钢铁主产区面临比其他地区更大的挑战,此时区域经济的衰退、潜在社会问题的风险都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关注。

5.应当关注弱势群体在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可能问题。在经济转型带来就业岗位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女性、年龄较大的职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职工往往最先面临失业,与此同时,他们所能获取的社会保障权益通常低于其他劳动者,且在再就业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困难。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采取了鼓励提前退休的政策,研究显示这些离职职工的再就业比例很低,而鼓励接近退休的职工提前退休,也存在损失更多生产率较高的劳动者的可能性。

就业是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最为重要的手段。尽管就业形势在不同国家有所差异,但解决失业问题、提高就业质量、改善就业匹配、增强劳动力市场活性、实现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和体面就业是不同经济体的共同目标。应对经济结构转型使就业结构面临的挑战,需要使就业政策与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结合。同时,就业政策的完善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政府预算、人口政策、行业政策等更广泛的宏观社会经济政策增加就业视角,设定就业目标。

注释:

①“8+1”社会救助体系指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临时救助为主体,以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

破解全球投资增长困局

陆婷

投资在短期创造需求,在长期则在供给方形成生产能力。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投资,未来就有什么样的增长前景。长久以来,投资也一直被视作是

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环节。

一、危机后各国投资水平均出现下滑

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国的投资水平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发达国家下滑尤为显著,这使得促进投资增长始终是危机后各国政府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它们希望通过推动中小型私人企业投资和战略性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张,使本国经济复苏迅速步入正轨,避免陷入“弱需求—低产出”的恶性循环。

可惜的是,尽管危机后许多发达国家都施行了宽松货币政策,营造了历史罕见的低利率环境,但就投资占GDP比重而言,不少国家都距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相差甚远,尤其是欧洲和日本。2015年,欧元区 and 日本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较2008年分别下降了10.6%和6.9%,占GDP比重仅在20%左右。经济复苏表现最好的美国,其投资虽基本恢复至危机前水平,却依旧低于其长期均值。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大都在危机后的一段时间快速恢复了投资水平,不过,近几年,受自身结构性问题和国际金融、经济环境波动性增强的影响,这些国家的投资动能也在逐步减弱。

金融危机对全球跨国投资和公共投资也打击沉重。全球直接投资(FDI)直至2015年才首次回升至危机前水平,达到1.7万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联合会的研究,2015年FDI增长主要由跨国并购导致,表明目前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旨在推进资产重组,而非扩张生产活动,这些资本流入仅改变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和金融账户,并不带来资源的实际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推动有限。

二、投资下滑的政策和金融因素

公共投资下滑主要是受各国财政整顿约束影响。OECD国家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在2010年和2013年间下降0.6%,为财政整顿目标的实现贡献了将近1/4。财政整顿问题越严重的国家,公共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越多,政府赤字占GDP比重平均每下降1个百分点,公共投资占GDP的比重就会被削减0.3%^[7]。因此,危机后各国面临的财政整顿约束也为投资增长带来了一定障碍。

而在私人部门,未来经济和政策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是导致企业,尤其是发达国家大型企业普遍投

资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2015年欧洲央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3%的欧洲企业认为,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是他们对欧元区外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障碍^[8]。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不存在资金层面的约束,不少企业在削减投资规模的同时,还在主动选择发放股息或回购股份以降低现金持有水平^[9]。相应的,在美国,企业较为担心监管、税收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用以衡量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 EPUI)在2009年、2010年及2012年财政悬崖之前急剧飙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回落一段时间后重新在2014年和2015年走高。除此之外,一些长期不确定性,如在气候变化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上的不确定,也使得企业对进行长期投资持保留态度。

对于小微企业来说,融资约束仍然是它们无法扩张投资的一大制约。在金融危机之后,小微企业的资金约束程度较危机前有所上升。根据此前欧盟28国的一项调查,在使用过或考虑使用的融资工具中,只有16%的小微企业选择了股权融资工具,4%选择了债券融资,而银行贷款(57%)、透支贷款或赊销(53%)仍是小微企业最常用的融资工具。因此,在银行大范围地进行去杠杆以满足监管要求时,这些小微企业愈发难以获得资金进行投资^[10]。

投资环境壁垒以及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足也是制约企业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市场准入壁垒、跨境贸易和投资的税收壁垒、良好商业行为准则体系的缺失都在不同程度上妨碍了资源流向最具有生产效率的企业,增加了企业投资生产的成本和负担,进而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此外,当整体经济需求的波动性显著增强时,不灵活的劳动市场使得企业无法及时做出相应调整。出于对未来风险管控的考虑,企业将在面临这种情况时选择主动缩减投资规模,为投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三、推动全球投资增长的政策方向

为打破全球投资增长乏力的僵局,促使经济增长重新回到正轨,有效的需求面刺激政策依旧不可或缺。但需要谨记的是,此类政策还应伴随着改善经济长期增长前景、提升市场信心的结构性改革措施。不仅如此,需求面刺激政策自身也需要更加有的放矢,并充分考虑到政策的协同和溢出效应。

具体来说,各国推动投资增长的政策可重点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在适度容忍政府债务扩张的前提下,有效调整和增加公共部门投资。如果使用得当,公共部门的投资不仅能在短期发挥提振需求的功效,还能够拉升经济体长期需求。因此,政府在制定公共投资决策时应当对投资的种类和质量予以关注,一方面可将资源配置到投资乘数效应较高的领域,另一方面可加大投资于一些未来有益于私人部门投资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公共研发、知识基础设施(knowledge infrastructure)、气候变化应对和环境保护等等。政府在公共投资中还可积极采用公私合作模式(PPP),在撬动公共部门资金的同时,提升投资效率。此外,政府可考虑施行部分税收优惠政策,以减轻小微企业投资所面临的融资约束。

二是降低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在财政政策方面,各国需要明确在现有经济增长率下如何实现财政可持续的战略和路径,这对欧元区国家来说尤为重要。美国则需要避免预算法案上的不确定性,不再反复出现债务上限之争。在货币政策方面,则需要清晰地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路径。除此之外,要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各国还应当在一些国际性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和合作,包括跨国公司税收处理、金融体系监管以及气候变化的应对等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尽快落实也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相关国家的监管政策不确定性。

三是实施有助于长期投资增长的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是促使全球经济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的核心所在,它能够支持和鼓励企业在资本和人力资源方面的长期投资,实现提升整体投资水平的目标。促进投资的结构性改革通常需要结合金融政策、市场监管政策以及产业政策三者之力。

金融政策应着力于保证金融机构能够为有发展前景的长期投资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监管层吸取了危机教训,意图通过防止过度金融化来提升整个金融体系对冲击的抵抗力。在这个过程中,监管当局增加了对养老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持有流动性较差资产的资本金

要求,直接导致这类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或其他长期投资项目成本的上升。这是各国政府需要注意的,金融政策框架应该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尽量鼓励机构投资者为项目提供长期资金而非予以阻挠。

市场监管政策则应鼓励市场公平竞争,减少市场准入管制,同时确保市场监管环境和融资安排能够使得基础设施项目获得足够的融资渠道。放松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管制,减轻降低监管要求对企业的负担,能够让企业以更低成本进行生产调整,从而提升企业在面临较高不确定性时的投资意愿;确保发展前景良好的基础设施项目能够获得畅通的融资渠道则有助于提升经济体长期增长潜力。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拥有明确的市场监管政策框架尤为重要,因为市场监管政策的频繁变动将导致企业投资趋于保守,不利于整体投资规模的扩张。

产业政策方面,政府需加强对研发、高新科技以及知识密集型行业的扶持。这类投资有利于推广和传播前沿理念和科技,从而能够从根本上带动生产效率的提高。研发相关的税收激励机制应进一步得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应该与时俱进,在保护知识产权,鼓励企业创新的同时,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鼓励市场竞争的政策相协调,以使得各项政策能够发挥最大效益。产业政策还需要对行业退出的相关条例予以关注,尤其是高新科技行业。由于技术更迭而导致的企业退出和破产,理论上不应该受到过于严厉的破产惩罚。保持高新科技行业进入和退出的活力,有助于资源的不断配置向更有效、创新含量更高的地方,进而提升经济长期增长潜力。

综上,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基本都处于弱复苏状态,实体投资持续增长乏力逐渐成为各国所关注的一大结构性难题。经济环境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政府财政整顿的压力、商业环境壁垒、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足等问题都令企业在扩张投资规模决策上裹足不前,导致全球经济较难走出低速增长的泥沼。要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多方政策的配合与协调,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同时推动大范围的结构改革,力求在拉动短期投

资增长之余,增强和培养一国的长期投资潜能,促使经济增长能够重新步入健康、快速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 [1]ECB. Public Investment in Europe[J]. ECB Economic Bulletin, 2016(2).
- [2]ECB. What Is behind the Low Investment in the Euro Area? Responses from a Survey of Large Euro Area Firms[J]. ECB Economic Bulletin, 2015(8).
- [3]OECD. Lifting Investment for Higher Sustainable Growth [J]. Compiled in OECD Economic Outlook 2015(January),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5.
- [4]OECD. Unlocking Growth: The Role of Investment, Innovation, Skills and Business Climate[J]. Compiled in OECD Economic Outlook 2015(June),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5.

全球贸易治理: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矛盾

苏庆义

所谓全球治理,根据张宇燕和任琳(2015)的定义,是指“由国家或经济体构成的多权力中心的国际社会,为处理全球问题而建立的具有自我实施性质的国际制度、规则或机制总和”^{[1]-29}。基于此定义,我们可以理解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贸易治理等概念,即全球贸易治理是国际社会为处理全球贸易问题而建立的具有自我实施性质的国际制度、规则或机制总和。当然,尽管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被普遍提及和使用,全球贸易治理的概念使用率还比较低。取而代之经常使用的概念是全球贸易体系、多边贸易体系、区域贸易安排等。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意思,即全球贸易治理主要涉及各经济体为处理贸易问题而进行的贸易合作或做出的其他安排。

一、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速受到冲击

目前,全球贸易治理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促进全球贸易增长。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EO Database)的统计,基于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2003年-2007年,全球经济增速平均每年是5.07%;危机期间的2008年和2009年,经济增速明显受到负面影响;2011年-

2015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为3.50%,相比危机前五年的增速下降1.57个百分点。因此,促进经济增长成为全球治理平台首要考虑的问题。

与此相对应,全球贸易增长受危机影响程度更大。2003年-2007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平均实际增速高达8.26%;而近五年的全球贸易平均增速仅为3.89%,下降4.3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远高于GDP。而且,基于我们的预测,未来几年全球贸易增长不会明显好转(苏庆义,2016)^[2]。国际贸易既可以用来衡量经济活力,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如何促进全球贸易增长成为全球贸易治理领域中的基础性问题。

二、全球贸易低速增长的原因

需求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均是全球贸易低速增长的原因。需求因素也被称为周期性因素,是指商品价格下降和世界实际产出下降影响贸易增速。关于这类因素,可以放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大框架内进行讨论,前面几篇笔谈文章,已经从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投资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结构性因素是指如下四点:(1)世界贸易增速下降主要源于货物贸易,尤其是其中耐用品的下降幅度远大于非耐用品(消费品)。(2)中国人世给世界带来的开放红利逐渐消失。(3)危机后的贸易保护措施明显增多。(4)全球价值链分工受到危机冲击,受损的全球价值链尚未得到修复。根据我们的研究(苏庆义,2016)^[2],全球贸易低速增长大约一半源于结构性因素,另一半源于周期性因素。

因此,在全球贸易治理中改善结构性因素将会起到促进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国际社会对全球贸易治理的需求。

三、国际社会对全球贸易治理的需求

具体而言,需求之一是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降低货物贸易关税、推进多边层面贸易自由化是释放全球贸易潜力的重要途径。在中国人世红利消失之际,应该通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贸易自由化拉动全球贸易增长。中国的开放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通过降低货物贸易关税尤其是中间品进口关税可以促进自身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不仅为自己带来出口增长,还能拉动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长。而且,发达经济体关税已经很

低,降关税的空间有限,发展中经济体则有更大降关税的空间。因此,应鼓励发展中经济体降低关税。这只有在多边框架才能实现。发展中经济体贸易开放更为依赖多边框架,在双边框架中才能争取到更合理的利益。多边框架的贸易自由化还能降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程度。多边框架有世界贸易组织(WTO),WTO可以通过监测各经济体的贸易保护程度、定期发布贸易保护指标来起到督促、威慑各国降低贸易保护的作用。

需求之二是构建包容和协调的全球价值链。由于生产要多次跨越国境,全球价值链分工能放大外部需求对贸易的拉动效果,并且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越深,放大效果越明显。在修复金融危机对价值链造成的破坏时,应注重包容性和协调性。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区域性价值链是北美价值链、亚太价值链和欧洲价值链。这三大区域价值链分工程度已经很深,相对成熟。为构建全球性的价值链,这三大价值链应逐步吸纳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融入。只有更多地让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才能一方面在全球价值链深化过程中创造更多的贸易,另一方面提高全球价值链的放大效应。包容性和协调性还指帮助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主要由大的跨国公司主导,中小企业融入程度还比较低,它们的融入将释放国际贸易的活力。

需求之三是呼唤多边层面的国际投资治理框架。修复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通过投资设立外企帮助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帮助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而且,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也越来越多,促进这类投资也能加深全球价值链分工。这需要建立全球层面的多边投资规则和组织,保护和促进对外投资,从而起到促进对外贸易的作用。

四、与全球贸易治理需求并不一致的供给端

与此同时,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制度供给与上述内在需求并不一致。具体比如:

供给之一是区域贸易协定占据主导地位,多边贸易协定谈判难以推进。在需要推进多边贸易自

由化之时,WTO多哈发展回合谈判却久拖未决,而且谈判前景不容乐观。2015年12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第十届部长级会议期间,甚至有美国代表提出要放弃多哈回合,重启新的回合。在此背景下,区域贸易协定大量涌现,而且新世纪以来出现巨型贸易协定(Limão, 2016)^[1]。所谓巨型贸易协定,是指成员国GDP总量和贸易总量都非常大,占世界的比重较高。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成员国贸易总额约占世界的25%,GDP总额约占世界的40%。目前的三大巨型贸易协定,除TPP外,还有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TTI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一个理想的状态是各类区域贸易协定和WTO互为补充,并能促进WTO多边贸易自由化。但是巨型贸易协定尤其是高标准的贸易协定是否能起到促进多边自由化的作用,争议性较大。

供给之二是全球价值链的排他性较为明显。巨型贸易协定的目的是构建区域性的价值链。为防止区域外成员享受区内成员降关税的好处,区域贸易协定要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原产地规则。TPP这一协定制定的原产地规则比已有的规则更为严格,从而不利于协定外成员参与区域价值链,也即TPP试图构建排他性的区域价值链。实际上,区域贸易协定既有可能促进也有可能阻碍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主要看其排他性的强弱。普通的区域贸易协定可以通过增强区域经济活力带动区外经济体的发展。但是目前具有排他性的价值链构建与为促进贸易增长而需要的包容协调的价值链并不一致。

供给之三是目前各国签署了大量的双边投资协定,尚没有多边投资规则。与全球贸易层面有WTO这一多边组织不同,在国际投资层面尚没有多边投资组织。事实上,各国签署了大量的双边投资协定(BIT)。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国际投资协定数据库(IIA Database)的统计,目前已经生效的BIT多达2278个,其他生效的国际投资协定也有285个。BIT当然也能促进对外投资,但是由于投

资规则的不一致,会增加企业对外投资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从而迫切需要整合已有的BIT。遗憾的是,目前缺乏多边投资框架。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局限性较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导的《多边投资协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谈判则早在1998年就已搁浅。

五、中国的努力方向

中国可以在任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期间致力于解决全球贸易治理中的需求和供给不匹配。全球贸易治理中的需求和供给不匹配只有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平台上解决,主要的解决之道是改善供给,以便和需求匹配。除贸易治理的平台WTO外,最重要的是G20。G20是既包括发达经济体也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有能力也应该肩负起改善全球贸易治理供给的义务。

2016年,中国是G20主席国。中国在贸易与投资议题的设计上充分考虑了上文讨论的议题。但是,我们认为中国应该为上述议题构建一个清晰的逻辑框架,以便更顺利地推进议题的展开。主要内容可以理解为:贸易与投资议题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全球贸易治理中的需求与供给不匹配问题,致力于全球贸易治理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以促进全球贸易增长为统领,寻求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路径,设计WTO后内罗毕时代的前进方向,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构建和谐包容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在G20平台讨论全球多边投资规则的原则性内容。

参考文献:

- [1]张宇燕,任琳.全球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国际政治科学,2015(3).
- [2]苏庆义.全球贸易低速增长之谜[Z].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IGI(国际问题研究)系列讨论稿,2016,201603.
- [3]Limão Nuno.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J]. NBER Working Paper, 2016, 22138.